

《本草原始》的生物图像流变及其启示

张 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本草原始》是晚明一部绘图精良的本草著作。其图绘中的局部图、剖面图、图注方式以及构图视角颇有新意,但绘图思想未有变革。该书流传较广,明清时期的私人刻书坊,尤其是周氏家族,对图像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图像在广为流传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形变,导致图像中的有效信息不断丢失。另有其他本草著作图像受其影响,但多是仿绘,未能跳出李中立的绘图模式。这种图像流传中的形变在当时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可能是由学术风气、书商利益等诸多因素造成。

关键词 《本草原始》 李中立 周氏家族 《本草图翼》

中图分类号 N092:Q-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15)02-0279-15

胡司德(Roel Sterckx)曾将图像分为两类:一为描写性图像(performative image),是指观察者将图像作为某一行为过程中的一部分;二是说明性图像(illustrative image),是对已有叙述文字进行补充的一系列图像^[1]。说明性图像在动植物描述中具有直观的作用,是生物描述体系的组成部分。植物学家张景钺先生曾有言“图是形态学的语言”^[2],可见图像之重要。在中国古代的本草学著作中,亦呈现出诸多形制各异的图像。这些图像在本草著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作者基于怎样的理念绘制出它们?图像在翻刻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演变?晚明李中立编绘完成的《本草原始》不仅在药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图像绘制上颇具特色,并且其图像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故而,本文试以《本草原始》为中心,来探讨本草图像在其绘制与传播中遭遇的变化。

1 《本草原始》图像的诞生及特点

李中立,字正宇,明代雍丘(今河南杞县)人,自幼敏而好学,多才多艺;少年之时,师从同乡中书舍人罗文英精研儒学;青年时“博极秦汉诸书”,深受当时县令马应龙的赏识,称其有“偏至之能”。正因精于本草、长于绘画的“偏至之能”,非医家出身的李中立才能凭借自己的精思力行,“核其名实,考其性味,辨其形容”,“手自书而手自图之”,于1612

收稿日期:2014-12-20; 修回日期:2015-04-13

作者简介:张钊,女,1985年生,陕西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史。

年完成了图文并茂的《本草原始》^[3]。

《本草原始》旨在讲述药物的本源,即药材的正确来源、形态及炮制方法。全书共 12 卷,按照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进行分类,共载药物 508 种。除石部、人部外,其余各部类药物原型皆为生物,全书共涉及动植物 390 种,绘制动植物图像 415 组,其详细的生物图像数量分析见表 1。

表 1 《本草原始》中生物图像数量分析

卷部类	1 草	2 草	3 草	4 木	5 谷	6 菜	7 果	8 石	9 兽	10 禽	11 虫(鱼)	12 人	总
药物	52	66	76	63	17	20	27	/	23	13	48	/	405
生物	52	67	74	63	13	20	26	/	22	12	41	/	390
图像	57	70	77	66	13	20	28	/	24	12	48	/	415

该书中的图像均为李氏通过观察实物,亲手绘制完成,所绘图像打破了自《本草图经》以来本草著作附图均为全株图的绘图模式,以植物局部形态呈现出来,注重图像细节,绘制精良,比例精确,并配之以准确的形态描述文字,还描绘出药材正品与赝品之间的差异,在动植物及药材鉴定上具有价值;其次,李氏绘图精美,李约瑟评价其绘图“看起来就像是在艺术大师门下学过绘画的天才的作品”^[4]。梅泰理认为《本草原始》“许多图具有清新感,看后似如一幅幅写生画”^[5],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以下就《本草原始》中的图像做以进一步的分析。

1.1 植物器官局部图的绘制

李氏所绘图像打破了以往本草中所呈现的全株植物绘制,仅绘制植物的特定器官或部位,如其在黄精条中所言“入药用根,故予惟画根形”([3], 3 页),李氏通过对实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绘制了大量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图像,这是本草学史上最早全面绘制的植物局部图。

李氏很注意突出不同植物器官的典型特征。在对根的描绘中,突出了根表皮横向皱纹与纵向皱纹的差异;其次,李氏对根的外形把握非常准确,表现出了苍术、郁金等储藏根(茎)的圆球形、椭圆形或者圆锥形外形,突出其肉质肥厚的特征。在茎的描绘上,李氏能够细致地描绘出茎节、节间特征,以及卫矛的木赤栓、通草的皮孔等典型特征。对于花序枝,李氏能够准确地绘出花的典型特征,比如小蓟、大蓟、红蓝花等菊科植物的头状花序,天南星科的佛焰花序,葱、韭等伞形花序等。在叶的绘制中,能准确描绘叶形、叶缘特征、叶脉以及叶柄着生方式等(图 1)。

1.2 植物剖面图的绘制

植物剖面图在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植物解剖学以及现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认识植物内部结构、植物分类与鉴定中极具价值。西方在 16 世纪时,已经绘制出大量精美的植物剖面图。而李中立在《本草原始》中所绘制的大量剖面图是我国生物图谱中最早的植物剖面图,尽管这种剖面图从以实用为目的的药物炮制中孕育而出。

在李氏绘制的天花粉(栝楼根)图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根的横切面,栝楼全根呈现



图 1 局部图

不规则圆柱形,对其进行横切后可以看到呈现放射状排列的木质部。而在青皮的绘制中,李氏则分别绘制出了纵剖面 and 横剖面。对芸香科植物枳实与枳壳的图像描绘更是精细,绘制了精细的横切剖面图,能清楚地看到枳实的厚实的外果皮及其上的油点、疏松的中果皮以及向外翻卷、合成瓣状的内果皮。(图 2)



图 2 剖面图

1.3 生物图像中的组合视图及不同视角的选择

《本草原始》生物图像另一显著特征,便是采用两张或两张以上不同视角的组合视图,最大限度地表达出生物体完整的形态特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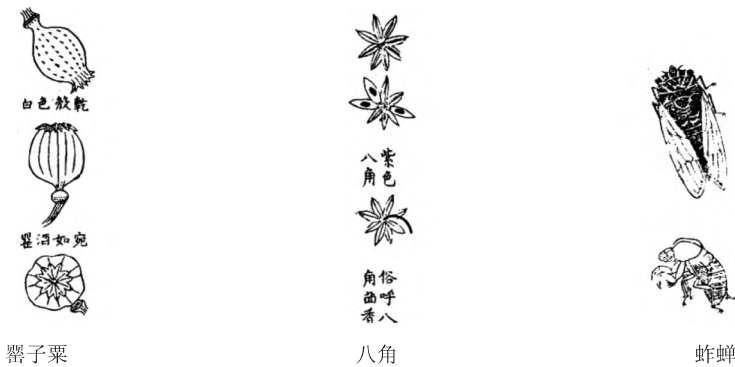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视角组合

在植物图中,李氏主要通过对植物不同角度的刻画来实现植物的完整表达。在植物叶片的描绘过程中,李氏多处采用正反两面叶片皆绘制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出叶正反两面的差异,同时兼顾叶子动态特征,更具写生画的情态。在植物花、果实等描述上,采用不同视角组合。在花与叶的绘画中,多遵循“前后扁宽,左右窄长”的透视规律^[6],从而对花叶进行复原,反映出其向背、折卷、反正、平侧等关系,改变了以往本草中的刻板。事实上,这

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绘画的要求了。

在对动物的描绘上,亦多采用多视角组合的方式。尤其在对昆虫的刻写中,常采用侧视与俯视结合,背甲部与胸腹部结合,展翅与合翅结合,力图展现出昆虫多角度的特征。在兽类的刻画中,李氏多采用侧视图,侧面物象最能表现其特征^[7]。在此基础之上,部分动物再采用头部回望的方式,从而更加精确地将其面部特征也刻绘出来,达到了最大程度表现动物特征的目的,同时兽类采用侧视图比正视图更能反映出动物丰富多彩的形体变化。

1.4 图文结合

图注是对图像的补充与解释,图文结合,以文字作为图像未尽部分的补充。而在李氏的图像之中,很多图像中都使用了图注。图注在此大致有三种功能,一是对于通过图像无法传达的重要信息辅之以文字信息,使图像更为丰满,以实现按图索骥的功能,比如,花色、茎的细节等等;其二是文字即为对图像的解说,比如,叶对生,在图像上亦表现出对生的画面,利用文字与图像两种载体形式,以增强感官印象;三是文字作为图像的标注,比如人参的头、尾、正、侧等。然而在以往的本草图像中,图像之中很少出现辅注文字,这既与画者对图像的认识相关,也与当时图文混排的雕版技术相关。(图4)



图4 图注

从绘图程式上看,李中立所绘图像较传统本草图具有很大的突破,然而其绘图思想并未有实质性的变革。唐宋以降,本草著作中逐渐出现图像,主要目的是辨别动植物,以正名物,解决同名异物的问题,防止本草用药中的混乱。李氏对植物局部图和剖面图的绘制,依旧承袭了传统本草图像的以“名物”为目的的绘图思想,而且正是从植物图到药材图的一个转变。这种做法想要指导的并非是在野外如何采药,而是在药肆之中,如何辨别药材的正伪。尽管对所谓的局部图与剖面图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但是一旦可以对药材进行分辨,其目的便已达到,而其工作便也止步于此了。

从绘图技法上,李中立显然受到艺术绘画的影响,其叶型、花型,构图方式多与画谱一致。比如,在菊花的绘制中,《高松菊谱》中就有“菊瓣朝心列,横长竖短……”的画诀^[8]。事实上,中国本草图像的绘制,从来都没有从艺术绘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特定的绘图套式,本草图像的绘制者本身就是画工出身,抑或是有所擅长的业余画者,并未形成专业的植物插图师,因此图像的准确性显然受到绘画者植物知识的制约,以及本草学者、画者与刻工之间的协作的影响。而李氏的本草图像,也正是其本草知识与绘画能力的一个

写照。

2 版本流传中图像的形变

《本草原始》自从 1612 年初刻本刊行以后,流传甚广,刊行版本颇多。龙伯坚曾介绍了《本草原始》在国内流传的 8 个明清版本^[9],《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列有《本草原始》的 26 个版本及其馆藏情况^[10],而王玠曾对《本草原始》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共列出了 35 个版本^[11]。《本草原始》在后世传承过程中主要分化为两个系统,即葛鼐校订的永怀堂版本系统以及《本草原始合雷公炮制》版本系统。以后诸多版本,均是在这两个版本基础上校订而成的。由于与《本草原始合雷公炮制》版本中与原始版本图像差异颇大,从图像的视角出发,可视其为两个独立体系,故而暂将其搁置,本文主要讨论葛鼐校订版本的图像及其传播。

2.1 版本流传过程中的图像演变

明代中晚期,刻书业异常活跃,书坊林立,而这些书坊出于盈利的目的,实用性较强的医药书籍是其主要刊刻的书籍类型之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当时众多私人书坊,成为《本草原始》得以传播的媒介。据王玠考察,在葛鼐校订之永怀堂本刊行之后,敦素堂和四美堂先后进行了重订,这两个版本在内容上与永怀堂本并无差异。其后,至清代嘉庆年间,经余堂又对其进行重刻,经余堂在体例编排与内容上也与四美堂完全一致,但其中所绘图像明显粗糙了许多。其后的文会堂再次对其翻印,之后又出现了翠筠山房、善成堂、信元堂等版本,这些版本的图像质量再次下降。尽管此书不断刊刻,但不同版本各卷所题校订人均均为葛鼐或周亮登。图 5 为版本源流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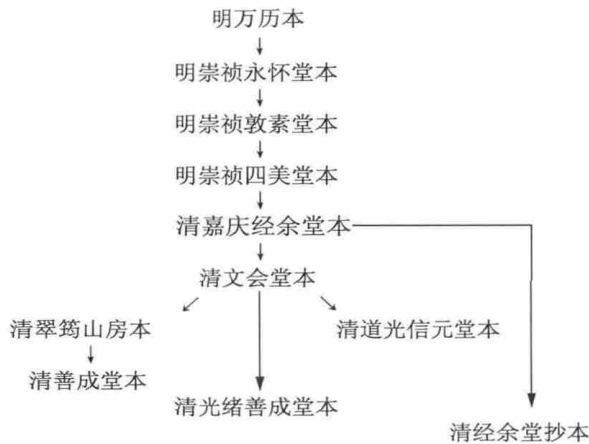


图 5 《本草原始》版本流传图^①

在各版本不断刊行流传过程中,可以看出本草图像质量逐步下降以至于后期版本图像多有形变。图像描摹的痕迹非常严重,刊刻者显然并不关心植物的真实形态,也并不理

^① 版本流传图据王玠考证结果绘制而成。

解绘图者通过图像所要传达的信息,仅是照着底本仿绘与刊刻,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科学性的错误。比如,车前的叶,在李氏版本中的弧形叶脉,到了永怀堂版本中,则变成其中部分弧形叶脉、部分网状叶脉,而在经余堂版本,则全然变成了明显的网状脉,叶缘形状也有所变化,穗状花序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从颇为形似的穗状演变成了点状程式图。文会堂版本,似乎与经余堂图像相似,但其雕版已经模糊不清了。而信元堂则更是进一步对图像进行了简化。(图6)再如,刘寄奴的图像情况也不尽好,在李氏原版中,所绘为其干形,枝叶弯折的部位,能看出植株风干后的脆性;在永怀堂版本中,干形变化不大,但弯折的部位变成了有弧度的弯曲状,显然与干形的样子不符;而在四美堂版本中,其干形的花略有些像叶子,以至于后期经余堂版本里,刘寄奴直接绘成了叶形。除了刻意描摹之外,后期的重刻版本,也缺失了艺术价值,所绘图像线条僵硬,并且对原有图像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



图6 不同版本车前图像对比

1638年葛鼐校订的永怀堂本(葛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李中立原本(李本)校订最早改动较大的版本之一,其后各个版本皆在葛本基础之上重刻。张卫等将葛本与李本进行了对比^[12]。在对图像的比较上,除了字体的变化外,其文主要述及图像的增删与更替,并未关注图像细节变化,除石部外,共列出药图差异16处^①。然而通过进一步考察药图,可以发现更多细节的差异。首先,李氏绘图时,在线条的运用上自然灵活,使得对诸如泽泻、黄连等根部的描写比较生动、写实,而葛本中线条明显过于僵硬刻板;其次,葛本中对很多图像进行了大幅度简化,比如地肤、卷柏、篇蓄、茵陈蒿、青蒿以及木部几乎所有图像等等;再者,葛本中仿照底本描摹的痕迹很重,以至于个别图像在模仿过程中有所失真;此外,两个版本在图注上也有所差异,李本个别图注是对图像中信息的补充、解释,而葛本中把一些图注内容或移入正文或直接略去。现将其中一些重要的图像差异详录如表2。

① 张文共列出24处差异,其中7处为第8卷石部,另张文以为李本缺沙苑蒺藜图,事实上是有的,故多列了一处差异,所以实际列出生物图像差异16处。

表 2 葛本与李本生物图像比较

药物	卷次	差异
透骨草	卷 1 草部	葛本未在图上标注花色
五味子	卷 1 草部	葛本与李本核的形状不同
车前	卷 1 草部	叶形: 李本为弧形叶脉, 葛本部分为网状叶脉; 李本穗状花序紧凑细致, 葛本以点状程式表示穗状花序
石斛	卷 1 草部	葛本未在图上标注茎的扁、圆
王不留行	卷 1 草部	李本绘出微抱茎, 而葛本未能绘出
栝楼	卷 2 草部	葛本比李本少了一幅天花粉图像(剖面图), 葛本在栝楼图中绘出了籽粒
香薷	卷 2 草部	李本绘其干形, 而葛本绘叶形
天麻	卷 2 草部	李本比葛本多一羊角天麻
高良姜	卷 2 草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红豆蔻	卷 2 草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小蓟	卷 2 草部	李本绘其花苞形状, 葛本绘花开时的头状花序
红蓝花	卷 2 草部	李本在绘制叶形时用点状来表示叶缘有刺, 葛本将叶形形成了二回羽状复叶; 李本有子形, 葛本缺子形
玄胡索	卷 2 草部	李本比葛本多一图
半夏	卷 3 草部	李本强调半夏的“脐”, 葛本未画出“脐”
商陆	卷 3 草部	李本突出了根部的皴纹, 葛本未绘制其根上皴纹
豨莶	卷 3 草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骨碎补	卷 3 草部	葛本比李本多一图, 应是不同产地之物(葛本所增之图似来源于《图经本草》中的秦州骨碎补图)
甘松香	卷 3 草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藿香	卷 3 草部	李本为叶缘有锯齿, 葛本为二回羽状复叶
松	卷 4 木部	葛本绘制琥珀, 李本绘制松树
巴豆	卷 4 木部	葛本少一图
连翘	卷 4 木部	葛本少一中瓢图
没药	卷 4 木部	生境不同, 李本树下有石块状物, 似如其文所述“脂液滴流在地, 凝结成块”; 而葛本树下为草
檀香	卷 4 木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黑大豆	卷 5 谷部	葛本多两个黑大豆图, 李本白色表示种脐, 但葛本在仿绘中种脐失真
黍	卷 5 谷部	李本图注中备有叶有毛
白芥	卷 6 菜部	李本绘其生境
葡萄	卷 7 果部	李本绘其叶为 5 浅裂, 而葛本将其绘制成掌状 5 出复叶
马	卷 9 兽部	李本与葛本不相同
鹿	卷 9 兽部	葛本未绘出鹿茸
蚱蝉	卷 11 虫部	葛本绘制一俯视图和树上的生境图, 李本绘制俯视图和侧视图
蚯蚓	卷 11 虫部	李氏中能看出绘制的蚯蚓环带, 而葛本中无明显区分

2.2 周氏家族在图像流变中的作用

葛本之后所流传的诸多版本中,一些卷间或会出现“周亮登校订”^①,但周亮登为何许人,至今却未见提及。在前人版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又发现《本草原始》在葛鼐校订之前的另两个版本,可能有助于梳理清楚其图像的流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周文炜校刊的《本草原始》,此本原为郑振铎藏书,《西谛书目》中记载如下“《本草原始》存六卷,明李中立撰,明周文炜光霁堂刊本,十二册,存卷一至二,五至八,有图”^[13]。日本国立博物馆亦藏有该版本的前8卷,该条目记载有“本草原始 12 卷 / (明)李中立编著并书画:(明)周文炜校刊……[出版地不明]:[光霁堂],[出版年不明]”,以上皆未提及校刊时间。而杜信孚在《明代版刻综录》中则载有“《本草原始》十二卷,明李中立撰。是书今人未提及。明天启书林周文炜光霁堂刊。”^[14]此外,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增订本草原始》12卷,并记录有“明李中立纂辑,明周亮登校订,明崇祯癸酉年[1633]刊本醉耕堂藏板”。这两个版本皆在葛鼐校订版本之前,可惜目前尚无法察见。不过通过对两位刊校者周文炜和周亮登的生平考察,我们能够从地域流传上为《本草原始》的图像传播提供一定的线索。

周文炜,字赤之,号如山,其所在家族是明末颇有名气的刻书世家,文炜为家族第二代刻书人。周氏家族先祖世居金陵金沙井,后徙江西抚州之金溪,定居柞下;周文炜之父庭槐游大梁(河南开封),占籍开封。周文炜曾为国子监生,并于天启三年(1623),以太学生身份任诸暨县主簿,有很好政绩,终因与县令不和,天启五年(1625)左迁王府官,复居金陵^[15]。周氏活动与交游范围极其广泛,尽管在李中立《本草原始》刊行之际,周文炜已离开开封,迁居南京,但是依旧与开封保持着密切联系,且周氏家族有为同乡刻书的传统,因此能够在金陵光霁堂刊刻此书,便也不足为奇了。

1633年重校《本草原始》的周亮登,则与刻书而闻名的周氏家族关系紧密。首先,周文炜有两子,一子周亮工^②,字元亮,另一子周亮节,字元泰,而周亮登,字元龙,从姓名字号上看,与周氏两子名字颇有渊源;其次,刊行周亮登校订版本的书坊——醉耕(耕)堂,则是周家从文炜至亮工、亮节父子、兄弟互相沿用的刻书坊堂号^[16];再者,《本草原始》中所题“金溪周亮登元龙甫校订”,而周氏家族祖籍金溪,周文炜、周亮工也时常称自己为金溪人,亮工更有柞下先生(柞下为其金溪祖籍)之称;此外,周亮登除校订《本草原始》外,还校订过金溪同乡龚贤廷的《寿世保元》,而在周亮登校订之前,该书就由周文炜光霁堂刊刻过([14],10页)。尽管尚无资料直接提及周亮登与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但据以上线索,笔者推测周亮登与周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极有可能为周亮工的

① 永怀堂本存在两种版本,其中一个全为葛鼐校订,另一版本卷8为周亮登校订;敦素堂和四美堂本,卷2和卷8均为周亮登校订,其余各卷为葛鼐校订;经余堂卷1、2、8、9、10、11、12为周亮登校注;善成堂版本目录题有周亮登校订,正文亦有多卷为周亮登校订。

②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緱斋,号柞园,柞下先生等。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南京。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山东潍县知县,迁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历任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亮工能诗善文,才思敏捷,诗学少陵,文必秦汉。嗜绘画、书法、篆刻,善鉴赏,爱收藏。著有《赖古堂文集》、《赖古堂诗集》、《读画录》、《因树屋书影》等,并传于世。

从父兄弟^①,为周氏家族第三代刻书人之一。

由于周亮登与周氏刻书行的密切关系,周亮登校订版本的底本来源或与周文炜版本相同,甚至也可能是周文炜校订的版本。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藏的周文炜版本题有“李中立编著并书画”,这与李氏原版是一致的;但1633年周亮登校订的版本,则题为“李中立纂辑”,而1638年的葛鼐版本中,亦为“李中立纂辑”。那么葛鼐版本与周氏版本是否存在关系呢?葛本之后的版本中,经常会出现部分卷由葛鼐校订,部分卷由周亮登校订的情况。本着卷目所题校订人不变,校订内容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化的原则,笔者对明崇祯四美堂本版周亮登校订的卷2与永怀堂版本葛鼐校订的卷2进行对比,发现二者无明显差异。首先,均将对植物产地、形态的描述用小字体,而功能主治改为大字体;其次,两者在体例、内容上无差异,且均剔除了艾叶一条,在内容上的增订也基本一致;其次,在与李中立原本出现差异的图像上,如天花粉、天麻、香薷、高良姜、红豆蔻、红蓝花、玄胡索等,这二者图像基本一致。所以这二者仅是刊刻的校订人不同,但在内容上并无实质性差异。

关于葛鼐,《江浙藏书家史略》载“葛鼐,字端调,昆山人,太常卿锡璠子,崇祯举人。……鼐益购所未备书,所藏达三万卷。”^[17]葛鼐藏书甚多,但鲜见其与医药相关之论述。而周氏家族自第二代刻书人周文炜起,就刊刻过大量医书,而周亮登在刊刻《本草原始》之外,还刊刻过《寿世保元》、《万病回春》等,皆是以治病之功效为主。笔者据此推测,葛鼐的校订工作极有可能是在周亮登的版本之上完成,并将其与《纪效新书》合刻,增补一序。在校订《本草原始》的过程中,对字体大小的更改足见校订者具备一定的医药知识,却更重视药物之功效主治,而较轻药物形态产地;此外,在校订过程中,增补的内容以功能主治条目居多,这似乎也是与周氏家族校订过大量医书的背景更相吻合的。或许也正是周氏家族的这种重功效而轻形态的理念,使得书中的图像信息在传承过程中有所损失。

3 其他著作对图像的转绘与传播

3.1 《本草原始》与《本草蒙筌》的图像关系

马应龙在为《本草原始》所做序言中提及,“皆手自书而手自图之”([3],序11页)。但是王玠认为李中立剖面图等并非原创,而是受到陈嘉谟的影响才绘制出类似局部图、剖面图等,他指出,“药材图引用了《本草蒙筌》中的一些,如天花粉、草果、海带等,并受到启发”^[18]。

《本草蒙筌》成书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而《本草原始》完成于1612年,《本草蒙筌》共12卷,从体例内容编排上看,《本草原始》确有借鉴于前者。然而就图像研究而言,应将图、文分而视之。所查证的图像皆出自明崇祯元年(1628)建阳书坊刘孔敦增补,万卷楼周如泉刊行的《图像本草蒙筌》,在此之前所存的各个版本——明嘉靖刘氏本、明万

^①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24“祭靖公弟文”中记有“父母生我同胞兄弟姊妹六人,第三妹先没,二姊亦继亡,去岁春,老孀姊又以七十病卒矣。今弟又云亡,四妹远在汴上”。可见,周亮工仅有一弟,即周亮节。故周亮登非周亮工的亲兄弟。

历周氏仁寿堂本中均无图像。但令人费解的是,在1628年的崇祯本中,陈嘉谟自序却提到“其义增补 绘刊图像”,而在此前的版本中,序言此处皆为“其义增前,其文减旧”,并未提及图像的绘制。至于这两个版本中原作者的自序为何会出现差异,暂且不得而知。但王重民先生和那琦先生在考察崇祯元年刻本时也均提及“谓原本品物无图,此本各增一图”权可作一佐证^[19 20]。综上可以认为,《本草蒙筌》的图像系后来增补,而在当时书籍插图盛行的时代,为以往没有图的书籍增补插图似乎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就《本草蒙筌》所录图像而言,大多出自于证类本草系列,多为全株植物的绘制,仅有少数出自《本草原始》。除王玠提及的天花粉、草果、海带外,尚有贝母、附子、天雄、天南星、玄胡索、昆布、常山、猪苓、乳香、丁香、雷丸、茄子等,而大蓟、小蓟在构图上也非常相似。就图像质量而言,《本草蒙筌》的图像远不及《本草原始》。其图像中的天花粉图与李氏原刊版的三幅天花图一致,而不似葛本系统中的两幅图,因此刘孔敦版本中的图像极有可能是参考了李氏原版。王重民在《中国善本提要》中指出,“刘孔敦建阳人,疑为乔山堂刘龙田之子侄,时乃兄孔教已成进士,乔山堂或已不继续刻书业,故孔敦为周氏帮忙”^[19 子部 258 页]。而贾晋珠更是提到刘孔敦与周氏书坊的联系,远不止于编校刻本,刘孔敦刊刻的《图像本草蒙筌》,所用之版就是周如泉在同时期印行该书的刊版,只是刊刻先后无法确定^[21]。据许振东的考证,金陵周如泉极有可能与周文炜如山有亲缘关系,两个书行也经常互相刊刻^[22]。因此,能够看到《本草原始》便也是不足为奇了。

3.2 《本草汇言》与《本草原始》的图像关系

《本草汇言》是明代又一部集大成的本草学著作,该书汇集当时众多学者本草之言,故名《本草汇言》,由钱塘倪朱谟成书于天启甲子年(1624)。然而该书在19卷所有图像绘制完毕后署有“万历庚申蒲月,萧山庠士汤国华太素甫绘图,钱塘处士翁立贤恒玉甫勒象”。可见,其图像绘制完成于万历庚申年(1620),仅晚于《本草原始》成书8年。然而,仔细观其图像,车前子、红蓝花等图像的细节绘制以及天花粉图像数量,与葛本如出一辙,可以判断其至少参考过葛本系统中的某个版本。最有趣的是卷2中的香薷图和藿香图,这两幅图显然是出自葛本系统,但汤国华似乎也被葛本系统中藿香的二回羽状复叶搞糊涂了,因此将这两幅图的图注标注反了。葛本及周亮登校订的版本皆在其后,而周文炜的版本,仅有杜信孚提及天启年间,其参考来源是《西谛书目》,而查阅《西谛书目》,并未注明刊刻时间。至于汤国华是从何处看到《本草原始》图像的,便不得而知了。但《本草汇言》中的图像,至少可以证明,在1620年之前,就已经对李氏原本的图像进行了大幅度的校订改动。

《本草汇言》中的图像不同于《本草原始》的图文混排,而是将每卷中所提及的动植物图像统一刊刻于该卷的卷首,图后再开始每卷正文内容。这种图像置于卷前,图文分立的做法,从刊刻的角度讲,可能便于雕版,降低了刻工的技术难度。然而从书籍的科学性上讲,显然不比图文结合者更便于阅读。文本与图像的疏远,会给读者在阅读时造成不便,时常需要翻页才能将文字描述的植物形态与视觉直观的图像联系起来。但柯律格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引用马兰安的观点说,图文并存的版本针对的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读者,而所谓的复合版本是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读者^[23]。然而这一观点可能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对于本草书籍而言,而图文置于同样位置,则更注重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在阅读植物形

态描述时,亦可方便对照植物形状。这种图文分立的布局,反而会造成视觉隔阂,并不具有医药书籍应具备的实用功能。或许,《本草汇言》的刊刻者便是将其与绣像小说中的插图等同进行编排了。

3.3 《本草汇》、《本草纲目类纂必读》与《本草原始》的图像关系

《本草汇》由吴门(今江苏苏州)郭佩兰编纂完成,刊行于康熙五年(1666),其中附有所谓本草汇图,每页4图,共计208幅。图前有本草图序,讲到“今兹所图,止取适用,无事繁杂,故凡用根则不及叶,用叶则不及根,并用则兼,暨果蔬、鸟兽、虫鱼之属皆然。”所表达的意思与李中立的“入药用根,故予惟画根形”如出一辙,其著作中列出了历代本草源流,但却未见提及《本草原始》、《本草汇言》等涉及药材图者。观其所绘药材图像,在绘画艺术性上堪称上乘,且与《本草原始》完全相同者甚少。但是,诸如葛花、葛根、断续、蒺藜等的构图上又与《本草原始》相对一致,因此,郭佩兰极有可能是看到过《本草原始》的,而本书中在剖面图上的表现又显然不及《本草原始》。

与郭佩兰同时代的何镇,在1672年据《本草纲目》编成《本草纲目类纂必读》,本书所附的“历代本草源流”中列出了郭佩兰的《本草汇》,但没有列出《本草原始》、《本草汇言》等书,可是很显然这里的图都是源自《本草原始》的,藿香、车前、知母、青蒿、狗脊、骨碎补、红蓝花、连翘、蒹蓄、刘寄奴等图与葛本系统完全一致。该书图像较好的一点是,半夏、葫芦巴和蓖麻子、山慈菇等图,更注重全株图和局部图的组合,从而更便于植物的鉴定,但是在剖面图的绘制上选取也较少。

3.4 《本草原始》在日本的影响

《本草原始合雷公炮制》在日本尚可见到从中国传入的乾隆甲戌年(1754)存诚堂本以及元禄十一年(1698)的和刻本。然而葛蕈系统的版本尚未看到日本存有。但是从稻生若水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葛蕈系统的版本17~18世纪肯定在日本流传无疑。

稻生宣义,字彰信,号若水,日本江户中期著名本草学家。早年研修医学、儒学、本草学等,从福山德顺学本草,博学多能,后自成一派,是本草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一生著述颇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校订、出版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在校订《本草纲目》(和刻本)的同时,并在1714年完成了《本草图翼》4卷2册,又著《结髦居别集》。他还对日本动植物和矿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完成了《庶物类纂》^①,奠定日本本草学的基础^[24]。此外,他还著有《炮炙全书》等。

据真柳诚^[25]整理的“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本”,可以看出,稻生若水所著的《本草图翼》、《炮炙全书》以及博物学巨著《庶物类纂》所引文献中均注明参考过《本草原始》,可见其受《本草原始》影响颇大。尤其《本草图翼》一书,所用图像及图注基本都出自《本草原始》。

《本草图翼》在编排形式上比较接近于《本草纲目类纂必读》,图文混排,很注重展现药物的图示;在编排体例上,《本草图翼》分为4卷,共包括草、木、谷、菜、果、金石、兽、禽、虫9个门类,仅去掉了《本草原始》中的人部。此外,《本草图翼》对《本草原始》原本的药

① 生前完成362卷,后由其门人继续著述,共764卷。

物顺序进行了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似乎是无意义的;并且增删了其中的个别药物,而这种增删,除了果部将龙眼、荔枝、枇杷几种日本当时并不广泛种植的植物删除外,其他的删减似乎也并无缘由。另外,《本草图翼》将牡丹、卫矛、芫花三种木本植物从草部调整到木部,这可能与作者强调自己的认识有关,并和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是一致的。

从图像上来看,《本草图翼》的图像几乎全部来源于《本草原始》,仅有棕榈等个别图像出自于《证类本草》系列的图像,而从篇蓄、地肤、车前、青蒿、骨碎补等图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图像的绘制与葛本系统如出一辙,而不同于李中立原版中的图像。有趣的是藿香一图(图7),葛本版本中,将李氏原本正确的单叶转绘成了二回羽状复叶,但在《本草图翼》中,可以看出其为单叶;而仔细对比其枝形,稻生若水所绘枝形又与葛本版本完全一致,不同于李氏原本。据此可以推测,在藿香插图的转绘过程中,可能由于底本的刊印模糊,抑或是永怀堂刻本雕版不精,而导致永怀堂本丢失掉了叶缘信息,仅绘制了其中的叶脉,而在后世版本中皆参考此图,绘制成如此之图像。而《本草图翼》中藿香一图的绘制,有可能是稻生若水修补而成,亦有可能是参考了葛本版本之前的底本,尚不好做定论。然而永怀堂本“藿香”一图的问题,也正反映了当时学风的浮躁。



李中立本



永怀堂本



《本草图翼》本

图7 藿香图对比

4 版刻图像流传中形变的普遍性及原因分析

事实上,不仅是《本草原始》的图像在流传中遭遇了这样的变化,明代周定王朱橚在永乐年间编订的《救荒本草》亦是如此。朱橚在园圃中亲自种植大量植物,仔细观察,并请画工绘制成图,进而编著成书。嘉靖四年李濂刊本的《救荒本草》,图例准确度很高,大多数植物都按图索骥,鉴定到科属乃至种。然而,该书中的植物图在流传复制中也遭遇了形变。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收录了该书,对其改易较多,除了卷帙及顺序的调整,图像也有很多变化。天野元之助对《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本)的图像变化进行了研究,指出13处图像差异,并提及图画本身就没有李濂刊本那样精美^[26]。可以看出,这些图像进行了很大的简化,比如图8中的邪蒿图。在车轮菜(车前草)中,徐光启也将弧形叶脉画成了网状叶脉,而在蚬蚨菜中却将原本错误的叶脉纠正过来。后来亦出现了许多以救荒植物为主题的书籍,包括王磐的《野菜谱》等。而后来鲍山的《野菜博录》,图像亦是直接来源于《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只是对其中图像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删减、增绘或者重

绘,很多图例仅是将原本的阳刻改成了阴刻^[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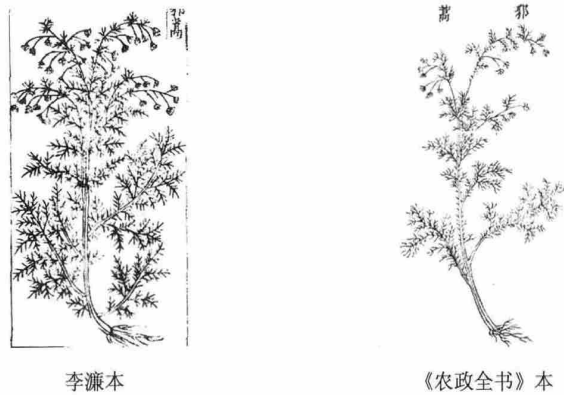


图8 邪蒿图

这种图像传播过程中普遍发生的形变可能有诸多原因。首先,从学风上讲,明代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在学术上空疏学风较盛,并且抄袭剽窃风气流行,这种风气不仅造成学术研究的浮泛与浅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社会风气^[28]。而对书籍的随意改动便是这种风气之下的产物。闵宗殿在谈及《救荒本草》的流传时,就讲到“任意改动原著,甚至乱改原著,这是明代一种极坏的学风。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甚至连当时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徐光启也不能幸免,《救荒本草》农政本的出现,便是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的产物。”^[29]尽管顾炎武等人早就对这种风气提出批评,然而这种风气的影响并非一时能够消除的。周氏家族对《本草原始》的改易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学风影响之下的产物,图像作为书籍的一部分,自然也难逃这种随意改动的命运。

其次,在明代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书商对利益的追求势必会影响到图像质量。王三庆对明代刻书成本与书籍售价进行了考察,刻工价格及刻工质量是影响售价的一个重要因素^[30]。而决定图像质量的,除了绘者水平,刻工的技艺同样重要,由一些廉价而技艺较差的刻工制版,可能会有效降低书籍售价,从而招徕各个阶层的读者能够支付得起书籍,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图像的质量。提高利润的另一种方法便是降低生产成本,采用一些低劣品质的便宜的原木材料以及容易刊刻、节省工时的松软枣木等用来制版,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书籍的粗制滥造^[30]。同样,这些劣质材料自然也会造成图像的简化、粗陋与失真。

另外,明代版刻书籍中,插图的数量远胜于以往。从书商角度讲,为书籍配以插图同样也是一种商业手段,可以加强图书在时市场上的吸引力。而这种版刻插图书籍的大量盛行以及版刻商业模式的扩张,在促进书籍传播的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出版物的质量,郎瑛曾对福建的书商进行了批评,尽管他所针对的仅是文本变质,但图像变形同样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对象([23], 32 页)。也就是这样,这些书坊在刻书的过程中,将本草之中的插图与其他绣像小说等的插图等同视之,忽略了它们用以鉴别植物的特性,使得很多优秀的本草图像淹没在明清书籍插图的洪流之中,沦落为一种符号或装饰。

还需注意的是,事实上,完全无损的保持图像不发生形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图像质量不仅取决于绘画,还取决于制版,不同书坊大多都会重新制版;另外,即使是同一个

板子用久了也会模糊,这也势必会造成图像信息的丢失。而在西方早期,这种植物图像上的“以讹传讹”在临摹中也是常出现的,甚至普林尼就一直在强调复制图像的危险性^[31]。

5 结 语

明代药物炮制技术发达,使得医药分工明确,诸多医生已不具备辨识药物本原的能力,以致出现“谬执臆见,误投药饵,本始之不原而懵懵”([3] 序 11 页) 的局面。此外,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在利润驱使之下,药材的使用中也出现了不少造假行为。这种环境下,李中立为了助于医生辨别药材,精心绘制了图像。正是在药材图的目的下,李氏绘制出了今日称之为“剖面图”和“局部图”的植物图像,在当时的本草图像中颇具新意。然而这种图像的绘制,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其辨别药材的目的一旦达到,便止于此。

在《本草原始》图像传播的过程中,周氏刻书行活跃的交游范围以及强大的刻书能力,使得这本书得以从开封流传到金陵,从而在江浙一带的刻书中心广为翻刻,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盛行的刻书坊为《本草原始》图像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这些私人刻书坊巨大的影响力,将李中立的最初版本精准的图像淹没在后来刊刻的诸多版本之中。在诸多因素影响之下,图像在流传之中发生很大形变,尽管如此,此书却能在明清两代被翻刻 35 次以上,这也从另一角度不得不让人对本草图像信息在实践中的价值表示怀疑。

在图像传承过程中,李氏在建立起药材图的绘图模式之后,后世的画者仅是对其进行仿绘,并未有所突破,这与当时只重视文本知识,缺乏对自然本身的关注的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这些图像的读者多属学者阶层,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有时会凭借前代本草图像对植物进行鉴定与判别。然而在实践阶层,真正进行药材鉴定与采药的人,几乎都是凭借其经验进行鉴别,正如本草著作中时常提及“见者自能分辨”,在学习期间亦多是依靠师承关系传习鉴定知识,而鲜有依靠书本与图像者。或许这种学者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隔阂,也是导致图像在形变状况下依旧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更是导致我国博物学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致 谢 感谢我的导师罗桂环研究员在本文选题与写作成稿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与宝贵建议。感谢在上海交大冬至会议及自然科学史所论文报告会上,各位老师同学给予的诸多修改意见。

参 考 文 献

- 1 Roel Sterckx. The Limits of Illustration: Animalia and Pharmacopeia from Guo Pu to Bencao Gangmu [J]. *Asian Medicine*, 2007, 4(2): 359.
- 2 朱至清. 图文并茂的《小麦形态解剖结构图》[J]. *植物学通报*, 1984, 2: 101.
- 3 李中立. 本草原始[M]. 郑金生, 汪惟刚, 杨梅香,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9~11.
- 4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植物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273.

- 5 安德列-乔治·奥德里古尔,乔治·梅泰理. 论中国植物的图[C] // 汉学研究. 第1集.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523.
- 6 于振洲, 于欣. 生物绘画技法[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145.
- 7 陆越子. 中国花鸟画构图法(下)[M] // 美术向导. 第27册. 北京: 中国美术出版社, 1990. 15.
- 8 高松. 高松菊谱·翎毛谱[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6. 1.
- 9 龙伯坚. 现存本草书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50.
- 10 薛清录.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203.
- 11 王玠. 《本草原始》版本源流、学术成就及药物品种考察[D]. 中医科学研究院, 1989. 5~10.
- 12 张卫, 张瑞贤. 《本草原始》版本考察[J]. 中医文献杂志, 2010, 1: 5.
- 13 北京图书馆. 西谛书目·五卷·题跋一卷·册2[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7.
- 14 杜信孚. 明代版刻综录[M]. 第2册. 江苏: 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10.
- 15 朱天曙. 周亮工家世考[J]. 中国文化研究, 2011, 3: 133~136.
- 16 陆林. 周亮工与金圣叹关系探微[C] // 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2.
- 17 吴晗. 江浙藏书家史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05.
- 18 王玠. 《本草原始》再考察[J]. 中国药学杂志, 1995, 30(9): 565.
- 19 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子部 258.
- 20 那琦.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本草之版本考察[J]. 中国医药学院研究年报, 1971, 2: 273~298.
- 21 贾晋珠. 吴勉学与明朝的刻书世界[C] // 法国汉学. 第13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3.
- 22 许振东. 17世纪小说书坊主周文炜及其家族刻书活动[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83.
- 23 柯律格.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M]. 黄晓鹃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7.
- 24 潘吉星.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412.
- 25 真柳诚, 友部和弘. 中国医籍渡来年代总目录(江户期)[J]. 日本研究, 1992, 7: 151~183.
- 26 天野元之助. 中国古农书考[M]. 彭世奖, 林广信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2. 154.
- 27 朱橚. 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M]. 王家葵等校注.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7.
- 28 杨绪敏. 论明代空疏学风形成和嬗变的原因及影响[C] // 史学新探.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65, 168.
- 29 闵宗殿. 读《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本)札记[J]. 中国农史, 1994, 13(1): 102.
- 30 王三慶. 明代書肆在小說市場上的經營手法和行銷策略[J].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2004, 3: 31~56.
- 31 安娜·帕福德. 植物的故事[M]. 周继岚, 刘路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67.

Changes in and Influence of the Images in the *Bencao Yuanshi*

ZHANG Fa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Bencao Yuanshi* (Origins of materia medica) is a sophisticated illustrated medical work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s imag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ome new ideas in the use of partial images, profiles, methods of annotation and image composition, though the concepts of drawing changed little. This work was widesprea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private printing workshop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Zhou family, were important in its transmission. However, this transmission also resulted in the steady loss of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age. Some other medicinal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its style, though they largely copied its images, and were unable to escape from Li Zhongli's stereotypes.

Keywords Li Zhongli, *Bencao Yuanshi*, Zhou Family printing workshop, *Bencao Tuyi*